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绩效

——基于营商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何文靓

(江西行政学院,江西 南昌 332000)

摘要:以“权力+市场”为特征的转轨经济体系中,中国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现象广泛存在,并对其绩效产生复杂而深刻的影响。本研究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全面考察政治关联、营商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探讨政治关联影响民营企业绩效以及营商制度环境对其调节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政治关联在短期内的确能够帮助民营企业突破发展瓶颈,但也给企业增加“政治负担”,不利企业内生性成长,同时亦导致整体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低效。此外,研究证实,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激活微观经济主体民营企业活力的关键在于构建法治化的营商制度环境。良好的“软”营商制度环境能够降低民营企业交易费用,减弱其政治关联的动机,规范和引导民营企业遵循市场的逻辑而不是非生产性寻利活动来追求自身价值。

关键词:政治关联;营商制度环境;民营企业;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098(2019)06-0040-08

一、引言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然而,眼下的中国经济却面临着极为严峻复杂的局面。国际上中美贸易摩擦仍在继续,全球经贸规则面临重大调整;国内民营经济预期不稳、信心不足,经济转型面临诸多难题。面对这些挑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即对市场经济的态度。眼下全球经济体之间的竞争,究其本质是各自市场经济体系的竞争。客观地讲,中国以往的经济奇迹的确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红利,然而经济全球化并非一成不变。经济全球化或将呈现新趋势,国际经贸、投资、金融规则可能出现深度调整,呈现“三零状态”(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面对这种局面,中央提出“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即对内通过深化改革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对外通过高水平开放对接国际规则,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这无疑是一个明智的政策选项:因为无论是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下一步国际经贸规则变局,还是国内稳预期、提信心,都将赢得主动。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推进的四十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呈现“五六七八九”^①的特征,是锻造“中国经济奇迹”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所讲,“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尽管民营经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但它所处的宏观制度环境却不容乐观,呈现高度的复杂和不确定性:一方面,当下的中国经济仍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基于市场经济的正式规则尚未完全确立,法律(对私有财产权的

^① “五六七八九”特征是指民营经济在中国整个经济体系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具体是说它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

收稿日期:2019-08-2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地方政府债务有效治理的金融监管体系研究”(18Bzz081)

作者简介:何文靓(1980-),江西九江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法制保护不足)和金融环境(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善)对经济行为的约束和保护依然处于断裂与空白状态;而另一方面,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所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关系”具有相当的广泛性和影响力。因此,构建政治关联,积极发展企业和政府的非市场关系,就成为民营企业获取发展的合法性、获取稀缺资源以及应对政策不确定性的必然战略选项。

然而,构建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亦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民营企业很可能成为实现较高政府目标的工具(比如就业最大化、产业政策等),抑或成为政府官员私人牟利的工具(比如政治升迁、敛财等)等等。而这些扭曲的政治经济行为将导致企业生产效率下降,导致民营企业生产经营的低效运行,而这一点,在制度环境较弱的欠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可见,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带来的成本和收益是十分复杂的。构建政治关联能否成为民营企业提升绩效的工具战略选项,事关民营企业发展战略和成长模式的合理选择,而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能否激发则关系到当下中国经济能否实现高质量转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再检验和再思考。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结合相关文献进行理论分析与假设演绎。第三部分描述本研究使用的数据,并定义相关变量;第四部分进行实证分析,分别检验三个假设: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是否有影响?营造制度环境对于民营企业绩效是否有影响?营商制度环境是否具有调节效应?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以及对企业和政府相关决策部门的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演绎

制度经济学鼻祖 North 认为,作为宏观层面的社会环境要素——制度是社会博弈的规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1]。后续研究中,他进一步将宪法、产权制度和契约等视为“正式的制度”,而将规范和习俗等视为“非正式制度”。而且他还发现了制度的有效性——即制度的选择最终能够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理想国思想往往是与现实社会的很多现象相悖的,比如,Allen(2002)^[2]等就曾提出“中国之谜”。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他提出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亦会对人们的“选择集合”产生重大影响,甚至成为解释影响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变量(Greif,1993;North,1994)^[3]。特别是对于一些正式制度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非正式制度通常能够作为一种补充或替代机制,达到弥补或调整因正式制度缺乏而造成损失的目的(Johnson,2003)^[4]。

企业总是处于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并且其行为倾向总是趋利避害的,因此企业的行为内生于其所在地的制度环境。回顾中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这种奇迹般的发展是在缺乏西方主流标准所列出的契约和产权制度的背景下取得的,而这些往往被视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那么研究这种企业的公司行为怎样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取决于微观经济主体宏观制度的应对模式。在本文中,笔者把民营企业与政府构建的政治关联看作是非正式制度的存在,而把营商制度环境中的地区产权保护水平、政府效率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看作是正式制度的存在。下面,本文进一步分别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 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绩效

现有的文献业已证明: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立竿见影的短期利益,主要涵盖:构建政治关联能够为企业带来资源获取效应(Allen et al.,2005)^[5]、信息效应(Faccio,2010)^[6]和产权保护效应(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7]。而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上述这些“效应”能够在中国情境中稳定存在并发挥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当下中国“为增长而竞争”地方经济增长激励机制,政治关联满足了地方官员在任期内政绩提升和企业短期内实现经营绩效提升的双重诉求。

然而,亦有诸多文献证明,构建政治关联虽然短期内提升企业绩效,但是从长远以及宏观层面来看,政治关联会“侵蚀”企业核心竞争力,降低企业价值和社会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表现如下:其一,构建政治关

联是企业的非市场化行为,为了维持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民营企业需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和资源,在核心能力建设投入上必然会减少。同政府、官员打交道会挤占企业家用于生产经营活动的时间和精力。其二,构建政治关联将诱使企业突破行业壁垒(李捷瑜,2012)^[8],离开原本擅长领域进入“非关联多元化”的经营状况,而在企业多元化的过程中所衍生的进入“新宠”效应“new toy” effect, Schoar, 2002)^[9]将“侵噬”企业核心能力;其三,构建政治关联会弱化企业创新激励(陈爽英等,2010)^[10]。Lei ben stein(1966)在剖析企业“X非效率”现象时指出:倘若企业能够依靠非市场的力量获取超额利润,相应就会丧失进行技术创新构筑核心竞争力诸如此类投入周期长、风险高的不确定性活动的动机。其四,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构建政治关联将会增加民营企业的政策性负担。中国官场现行的“GDP 晋升竞标赛”让地方政府有动机和能力要求其辖区的民营企业承担政治目标:比如就业、发展地方经济、社会稳定、改善地方形象等,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必然会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偏离价值最大化,损害企业绩效^[11]。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1: 政治关联抑制了民营企业的绩效提升。

(二) 营商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绩效

营商制度环境是中国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软”环境基础,也是中国与国际接轨、与世界前沿对接、深度全球化的具体举措。为此,近年来,党中央就营商制度环境的优化高频发声: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要“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明确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建设目标。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民营企业座谈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推进中部崛起座谈会等多种场合多次强调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性。

党中央屡次强调的“营商环境”从本质上来讲是“制度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企业的投资经营除了受市场力量影响之外,还将面临以法律、政策等制度力量的影响。换句话说,企业的战略抉择不仅会受所属产业和企业内生能力的影响,而且还是其所处的特定制度环境型塑的结果^[12]。通常而言,较好的营商制度环境意味着良好的产权保护、公正的司法体制、有效的契约执行以及对政府权力滥用的限制。良好的营商制度环境让企业能够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资源,诱导企业家生产性努力,即进行社会财富的创造而非鼓励非生产性活动,甚至破坏性活动方面。以上分析表明,区域的营商制度环境不仅是企业生产经营的背景条件,更决定了企业在制定和执行战略以及构建竞争优势过程中能做什么。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 良好的营商制度环境提升民营企业绩效。

(三) 基于营商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下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影响

在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不同地区由于受历史条件、中央政策、资源禀赋、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营商制度环境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于蔚,2012;贺小刚,2013)^{[13][14]},这就为本文分析研究各区域的营商制度环境对于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从理论层面来看,一般而言,营商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民营企业面临的政策波动性和行政管理模糊性较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民营企业决策成本和政治风险^[15]。此外,良好的营商制度环境能够引致充分的市场竞争,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而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和信用体系也使得契约的执行承受较低的违约风险。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资源环境和信息传播环境,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政治关联所具有的声誉信号作用。

与之相反的是,糟糕的营商制度环境下,民营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巨大,且随时面临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混沌性,迫使民营企业不得不将构建政治关联作为获取资源、应对政治不确定性和行政管理不确定性(Guthrie, 1997)以及拓展民营企业外部生存空间的必然选择^[15]。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3: 营商制度环境能起到调节作用,即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减弱。



图1 政治关联、营商环境和民营企业绩效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 2015—2018 年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类公司、上市时为国企后来改制为民营企业的公司、财务状况有问题的公司,最终得到 2703 个公司的年度观测值。民营企业政治关联数据通过手工整理上市公司年报收集,反映企业绩效的财务数据来自于 Wind 数据库。而衡量营商环境的数据来源于王小鲁和樊纲等(2017)著作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

(二) 变量的测度

1. 民营企业绩效

企业绩效是反映公司经营的业绩和效率,是通过企业绩效指标反映的^[16],本研究参考 Li 等(2008)等的研究,采用财务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 = \text{企业当年净利润} / \text{总资产的平均值}$)以衡量民营企业的绩效。

2. 政治关联

通过对现有研究领域有关政治关联文献的梳理发现,研究者们(胡旭阳,2006; Fan et al., 2007; 陈钊等, 2008; 罗党论和唐清泉, 2009a, 2009b; 刘慧龙等, 2010)多以民营企业高管的政治身份作为企业政治关联的代理变量。

本研究对政治关联(political)的度量采用评分的方法而不是虚拟变量^①的方法,本研究采取如下方法来衡量政治关联指标:首先,通过逐个整理样本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管的资料,将所有高管中政治关联最高的层级作为其政治关联的度量指标。其次,根据政治层级定义政治关联强度: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将其赋值为 4;省人大代表或省政协委员,将其赋值为 3;市人大代表或市政协委员,将其赋值为 2;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将其赋值为 1;非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将其赋值为 0。

上述涉及政治关联的信息搜集整理于 WIND 数据库,通过公司年报获取本年度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信息,然后在 WIND 数据库中查找他们当年或过往年度是否担任过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通过人工梳理建立起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数据库。

3. 营商环境

在衡量营商环境软环境的调节作用时,本研究采用了地区的制度特征虚拟变量 InstitutionD 和 InstitutionD 与政治关联虚拟变量 Institution D × Political 以检验不同区域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而具体在营商环境变量的选择上,本研究借鉴余明桂和潘洪波(2008),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的研究,选取市场化指数、法律环境指数和金融发展水平这些指标。

4. 其他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选取参照 Li 等(2008)、Faccio(2009)、余明桂(2008)等、邓建平(2009)和邹悻(2007)等的研究来进行,表 1 对主要控制变量做了简要说明。

① 现有的关于政治关联测度,已有的研究多是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即当企业高管中至少有一位曾经或现在是政府官员时,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但是笔者以为,鉴于中国官本位情景——“官大一级压死人”,民营企业家不同层次(全国、省、市、县、区、非人大代表等六个等级)的政治身份其政治关联的强度也有可能不同,因此简单地把各个层次的政治身份都赋值为 1,这与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

表 1 控制变量的定义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大股东持股	Fhold	股权集中度
公司规模	Size	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erage	负债/总资产
行业竞争程度	Indcomp	主营业务收入/当年所在行业所有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之和
公司年龄	Age	企业成立年份到样本年份之间年数的自然对数
年度	Year	虚拟变量,属于该年度记为 1,否则为 0

注:***、**、*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括号中为 t

四、实证分析

由于本文数据为非平衡面板,可能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 2。如表 1 所示,政治关联变量回归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为负,说明民营企业构建政治关联降低了民营企业经营绩效,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H1: 政治关联抑制了民营企业的绩效提升。市场化指数变量、法律环境指数变量和金融发展水平变量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制度环境越优良,企业经营效率也就越高,这与本文的假设 H2 相符: 即良好的营商制度环境对民营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提升企业绩效;为了进一步研究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是否因民营企业所在地区的营商制度环境水平不同而存在差异,本研究将政治关联变量与 3 个制度环境代理变量(市场化指数、法律环境指数和金融发展水平)的交叉项,即: 政治关联 × 市场化指数、政治关联 × 法律环境指数、政治关联 × 金融发展水平分别代入回归模型中,对研究假设 H3 进行检验。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研究对上述交叉性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回归结果见表 1 中模型 3、模型 5 和模型 7。结果显示: 交互项政治关联 × 市场化指数、政治关联 × 法律环境指数前面的系数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政治关联 × 金融发展水平前面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就表明在营商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越弱,从而也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H3: 营商制度环境能起到调节作用,即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减弱。

表 2 政治关联、营商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绩效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政治关联	-0.126*** (-4.19)	-0.109*** (-3.69)	0.094*** (-3.08)	0.113*** (-3.82)	0.100*** (-3.28)	0.131*** (-4.40)	0.122*** (-3.98)
市场化指数		0.067 -7.64	0.115 -10.33				
政治关联 × 市场化指数			-0.11 (-4.06)				
法律环境指数				0.02 -7.15	0.033 -8.34	0.05 -3.34	0.09 -4.21
政治关联 × 法律环境指数					-0.088 (-3.00)		-0.035 (-1.26)
金融发展水平						-0.007 (-7.81)	-0.007 (-6.57)
政治关联 × 金融发展水平						-0.011 (-3.44)	-0.014 (-4.77)
总资产收益率 (ROA)	-0.007 (-7.19)	-0.007 (-7.61)	-0.007 (-6.75)	-0.007 (-7.71)	-0.007 (-6.97)	-0.007 (-7.81)	-0.007 (-6.57)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公司年龄	-0.012 (-3.98)	-0.011 (-3.56)	-0.013 (-4.38)	-0.012 (-4.03)	-0.013 (-4.15)	-0.011 (-3.44)	-0.014 (-4.77)
公司规模	0.81	0.799	0.797	0.802	0.803	0.808	0.812
资产负债率	-42.69 -1.717 (-6.11)	-43.25 -1.474 (-5.28)	-41.76 -1.35 (-4.85)	-43.1 -1.499 (-5.33)	-43.07 -1.372 (-4.93)	-43.17 -1.823 (-6.55)	-42.09 -1.494 (-5.29)

五、研究结论与实践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是“中国模式”最为鲜明的制度环境特征,在唯 GDP 政绩考核的政治语境中,辖区间激烈的晋升竞争促使地方政府向民营企业伸出了“扶持之手”^[17]:提供各种商业便利(比如全程电子平台、最多跑一次、一窗受理等)和廉价的公共资源(各种形式或名目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廉价土地、低门槛环保、劳工保护等等),甚至演化为“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的态势^[18]。在这里需要聚焦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是否以效率为导向、无歧视地向所有企业无偿地伸出“扶持之手”。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政治上集权”的特征决定了政府对民营企业管制的相对强势,此外,政府的管制方式在“转型经济体”背景下又缺乏严格的刚性约束。因此,一个合理的逻辑推论就是:民营企业为了构筑竞争优势,不仅需要注重市场的竞争能力建设,更要注重与政府构建政治关联,才能获取“扶持之手”的帮助,比如对非正式产权的保护、进入被行政垄断的市场、税收优惠和廉价的生产要素等等。但是,民营企业在获取诸多“好处”的同时,也承担了诸多“政治包袱”(就业、慈善捐赠、政府偏好的投资政策目标等),政治关联对于民营企业成本收益的影响是复杂和深刻的。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众所周知,一个经济体的高质量发展是建立在微观经济主体企业的质量和生命力之上。特别是当前国内外面临的诸多挑战,更是意味着中国以往发展所依赖的“要素红利”和“政策红利”将逐渐让位于“创新红利”(企业层面的技术、管理创新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这就将企业注重自身能力建设,提升品质绩效和政府打造营商制度环境推到关键位置。本文聚焦上述问题,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政治关联、营商制度环境和民营企业绩效模型,探寻政治关联对于我国民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以及区域间营商制度环境迥异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机理。并以 2015—2018 年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三点结论:政治关联抑制了民营企业绩效的提升;营商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绩效;营商制度环境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向调节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的抑制作用,即营商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绩效投入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弱。

(二) 实践启示

上述研究结论对于企业的管理者和相关政府决策部门均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1. 对于企业管理者启示

尽管政治关联能够在短期内给民营企业带来立竿见影的“便利”,但从长远来看,政治关联降低了民营企业的绩效:政治关联扭曲了民营企业基于利润最大化的发展战略选择;民营企业不惜背负“政治包袱”构建政治关联^[19],以便进入政府管制行业以期获取垄断利润。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将不可避免陷入“多元化”甚至非相关的多元经营之中,将会侵蚀其核心竞争力^[20]。所以,作为企业管理者应该警惕政治关联这把“双刃剑”,评估构建政治关联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之后再做审慎决策。

2. 对于政府相关决策部门的启示

当今世界的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地区的营商制度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辖区政府的政策供给能力和速度^[21]。根据上述研究结论,地方政府应尽快改善地方营商“软”制度环境,

构建区域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其一,深化市场化导向的改革,真正做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构建高水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市场“出清”机制,挤压企业的寻租空间,避免形成“政治关联泛滥—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侵蚀—政治关联更加盛行…”^[22]的恶性循环之中。

其二,提升政府打造“营商软制度环境”的能力,增强政策的透明性、可预期性以及通达性,规范引导企业通过市场的逻辑和从事生产性活动来实现绩效和企业未来价值的提升,而非扭曲为政府的政治附庸。

其三,优化营商环境的价值取向,从非均衡发展转向“竞争中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5月22日在江西视察考察时所指出:“要努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不要老想着争优惠政策,而是要勇于开展首创性、差异化的改革探索”。唯有构建“竞争中性”价值取向的营商制度环境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歧视,真正意义上打破针对民营企业发展所设置的“卷帘门”“玻璃门”“旋转门”,这才是政府给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定心丸”。

参考文献:

- [1] 道格拉斯·C. 诺思.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M]. 上海: 格致出版社, 2008.
- [2] Chang, E. C. and Wong, S. M. L. Political Control and Performance in China's Listed Firm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4, 32(4): 231 - 233.
- [3] Williamson, O. E.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0, 38: 53 - 56.
- [4] Johnson S, Mitton T. Cronyism and Capital Controls: Evidence from Malaysia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3, 65(3): 342 - 344.
- [5] Allen F, Qian J, Qian M.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5, 77(2): 66 - 68.
- [6] M. Faccio, Differences between Politically Connected and Nonconnected Firms: A Cross - Country Analysis, *The Financial Management*, 2010, 39(3): 905 - 928.
- [7] 罗党论, 唐清泉.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制度环境与绩效问题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9(2): 20 - 22.
- [8] 李捷瑜. 多元化经营 R&D 投资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2): 200 - 208.
- [9] Schoa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s a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2, 15(4): 604 - 606
- [10] 陈爽英, 井润田, 龙小宁, 等. 民营企业社会关系资本对研发投资决策影响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10(1): 43 - 44.
- [11] 张建君, 张志学.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 [J]. *管理世界*, 2005(7): 18 - 21.
- [12] 余明桂, 潘红波. 政治关系、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 [J]. *管理世界*, 2008(8): 8 - 10.
- [13] 于蔚, 王淼军, 金祥荣. 政治关联和融资约束: 信息效应与资源效应 [J]. *经济研究*, 2012(9): 14 - 17.
- [14] 贺小刚, 张远飞, 连燕玲, 等. 政治关联与企业价值——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比较分析 [J]. *中国工业经济*, 2013(1): 12 - 14.
- [15] 杨其静. 企业成长: 政治关联还是能力建设? [J]. *经济研究*, 2010(11): 9 - 12.
- [16] 邓新明. 我国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多元化战略与公司绩效 [J]. *南开管理评论*, 2011(4): 12 - 16.
- [17]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 [J]. *经济研究*, 2007(7): 22 - 23.
- [18] 徐业坤, 钱先航, 李维安. 政治不确定性、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J]. *管理世界*, 2013(5): 26 - 27.
- [19] 钱先航, 徐业坤. 官员更替、政治身份与民营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 [J]. *经济学(季刊)*, 2014(4): 30 - 31.
- [20] 于蔚. 政治关联为何降低企业绩效——基于生产效率的解释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6(3): 16 - 17.

- [21] 刘凝霜. 政治关系、非正式制度与民营企业发展路径——基于研究脉络与理论逻辑的双视角考察[J]. 经济学动态, 2016(10): 23 - 24.
- [22] 李雪灵, 蔡莉, 龙玉洁, 等. 制度环境对企业关系的影响: 基于中国转型情景的实证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8(10): 11 - 12.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Analysis of the Adjustment Effect Based on the Busines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E Wenjing

(The Jiangxi Institute of Administration, Nanchang, Jiangxi 332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transforming economy, by the characteristic of “Power and Market”,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set up the political connection widely, and which has a complex impact on its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study comprehensively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connection, business system environment and privat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explores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on privat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and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business system environment on it.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in the short term, political connections help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to break through the bottleneck of development, but they also increase the “political burden”, and distort the decision - making of the enterprises’ endogenous growth, and lead to in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t the macro level. In addition, the study also confirms that: At the stage of high -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key to activating the vitality of the micro - economic main body - private enterprises lies in building a legal business system environment. A good “soft” business system environment can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weaken their motivation of political connection, and standardize and guide private enterprises to follow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rather than non - productive profit - seeking activities to pursue their own value.

Key words: Political connection;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 private enterprise; the firm performance

(责任编辑: 罗序斌)